

曲碑考論

张进德
著

人民出版社

013069133

I206.2
139

曲碑考論



张进德
著

人民出版社



北航 C1676426

I206.2

139

013063133

责任编辑：刘智宏 苏向平

封面设计：阳洪燕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曲稗考论 / 张进德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8

ISBN 978 - 7 - 01 - 012445 - 2

I. ①曲… II. ①张…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元代
②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明清时代 IV. ①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87991 号

曲稗考论

QU BAI KAO LUN

张进德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8.25

字数: 275 千字

ISBN 978 - 7 - 01 - 012445 - 2 定价: 4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 如有印制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 (010) 65250042

·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中州曲唱 | 1 |
| 一、元曲与河南 | 1 |
| 二、元代中州散曲作家 | 9 |
| 第二章 曲海人生 | 21 |
| 一、市井平民的真情与失意文人的悲怆 | 21 |
| 二、从东篱散曲看元代文人的心路历程 | 31 |
| 三、钟嗣成与贾仲明的【凌波仙】吊词 | 46 |
| 四、明代皇族散曲家 | 58 |
| 第三章 曲海探奥 | 74 |
| 一、元杂剧“题目正名”考释 | 74 |
| 二、元代士妓爱恋杂剧的文化解读 | 89 |
| 三、世俗心态与士子情怀的特殊混融 | 99 |
| 四、徐渭的自吊之作——《四声猿》 | 113 |
| 第四章 曲稗渗透 | 128 |
| 一、《金瓶梅词话》中的散曲 | 128 |
| 二、《金瓶梅词话》对戏曲的援用及其价值 | 141 |
| 第五章 稗乘索赜 | 153 |
| 一、任昉评传 | 153 |

目
录

| | |
|----------------------------|------------|
| 二、殷芸简论 | 159 |
| 三、“传奇”辨 | 165 |
| 四、《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本事补正 | 170 |
| | |
| 第六章 稗乘谭隽..... | 177 |
| 一、《三国演义》艺术品格再认识..... | 177 |
| 二、论《聊斋志异》中的梦 | 192 |
| 三、被阉割的女儿性..... | 203 |
| 四、从《镜花缘》看李汝珍的婚姻观 | 217 |
| | |
| 第七章 稗乘抉隐..... | 226 |
| 一、《四库全书总目》“序文”价值发微..... | 226 |
| 二、《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价值初探..... | 240 |
| 三、《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指瑕 | 251 |
| | |
| 附 录：20世纪元代小说研究..... | 260 |
| 一、20世纪前五十年的研究 | 260 |
| 二、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研究 | 262 |
| 三、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研究 | 266 |
| | |
| 后 记 | 284 |

第一章 中州曲唱

一、元曲与河南

中国戏剧的发展成熟，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历史过程。原始社会的歌舞，西周末年的俳优，已包含有戏剧的某些因素。汉代百戏的摇篮中，孕育出中国戏剧史上最早的剧目——《东海黄公》。六朝及隋唐的《钵头》、《大面》、《踏谣娘》等歌舞节目，已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表现力。参军戏更标志着后世戏剧角色行当分工的滥觞。宋金时代，中国戏剧已完全成熟。从南宋周密《武林旧事》中所列的 280 种宋官本杂剧剧目及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所载的 690 种金院本名目，可见其剧目之繁多，题材之广泛；表演方面，艺伶辈出，生、旦、净、丑等角色行当已臻完备，戏剧演员的社团组织随之出现；歌舞戏、参军戏、杂剧、南戏等多种戏剧形式争奇斗艳。在宋杂剧和金院本基础上，融合宋金以来音乐、舞蹈、说唱等各种艺术样式而形成的元代杂剧艺术，标志着中国戏剧艺术的高度繁荣，在中国戏剧史、中国文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序》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

后世莫能继焉者也。”^①与唐诗、宋词一样，元曲成为一代代表文学。这里所说的元曲，实际上包括散曲和杂剧两个部分，但由于元杂剧的成就尤其突出，所以人们也常把元曲作为元杂剧的专称。元杂剧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对明清传奇、小说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些优秀剧目，诸如关汉卿的《窦娥冤》、《救风尘》，王实甫的《西厢记》，白朴的《梧桐雨》，马致远的《汉宫秋》，纪君祥的《赵氏孤儿》，石君宝的《秋胡戏妻》，康进之的《李逵负荆》等，700多年来一直上演不衰，而《西厢记》、《赵氏孤儿》、《看钱奴》等一大批作品更是被译成多种文字，流传世界。元杂剧不仅是中国艺术的瑰宝，而且是世界艺林的奇葩；它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财富，也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河南地处中原，人杰地灵。中原的社会生活，自然也成了元杂剧作家的主要表现对象。在现存的150多种元杂剧中，以中州地区为故事背景的作品竟达60多种。^②就地域来说，豫东的开封，豫东南的淮阳，豫西的洛阳、汝阳、渑池，豫西南的南阳，豫南的汝南以及豫中的郑州、荥阳等地，都成了元杂剧中主人公活动的重要场所。就作家来说，无论是河南籍的杂剧作家，还是非河南籍的杂剧作家，写过中州生活的几达30人，被誉为“元曲六大家”的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白朴、郑光祖、乔吉，都无一例外地在剧中反映出丰富多彩的中州生活。就现存的60多种反映中州社会生活的杂剧作品的取材来看，涉及司法吏治问题、妇女问题、婚姻问题、交友处世问题以及神仙度脱、发迹变泰、风情习俗等，不仅有着很高的文学价值，而且为我们研究元代中州文化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极为腐朽黑暗的一个朝代。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防止各族人民的反抗，有意在民族之间制造矛盾和隔阂。他们将全国人口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不同等级的人在政治、经济、法律上享有不同的待遇。“一等权富豪霸之家，内有曾充官吏者，亦有曾充军役杂职者，亦有泼皮凶顽者，皆非良善，以强凌弱，以众害寡，妄兴横事，罗织贫民，骗其家赀，夺占妻女，甚则害伤性命，不可

①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② 李春祥：《元杂剧论稿》，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6页。

胜言。”^①蒙古人、色目人凭借种族的优势和法律上的特权，横行不法，为非作歹。然而，富有反抗精神的黄河儿女并没有俯首帖耳地任其宰割，而是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在关汉卿的《蝴蝶梦》中，自称“打死人不偿命”的权豪势要葛彪无故打死了中牟县的王老汉，王老汉的三个儿子不惧这个皇亲国戚的赫赫权势，为父报仇，打死葛彪，与元代腐朽的法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黄河人民有自己的评价准则，正如王老汉之妻王婆所说：“使不着国戚皇亲，玉叶金枝；便是他龙孙帝子，打杀人要吃官司！”杀人偿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种呼声不仅体现了河南人民可贵的反抗精神，同时也是对元代反动律令的大胆否定！

元蒙时代，统治者横征暴敛，水、旱、蝗等自然灾害又时有发生，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而河南的灾害尤为频繁而且严重。天灾和人祸使黄河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统治者为防止饥民滋事，危及政权，曾经施行过所谓的“赈恤”。但由于元代政治腐败，贪官污吏、权豪势要往往乘“赈恤”灾民之机大饱私囊，祸害百姓。《元史·食货志》载，当时“赈粜粮多为豪强嗜利之徒用计巧取，弗能周及贫民”^②。无名氏的《陈州粜米》，围绕官府到河南陈州（今淮阳）开仓粜米这一事件，揭露统治者“赈恤”的实质，反映出黄河人民生活的悲苦以及他们不畏权势、勇于反抗的斗争精神。剧本写陈州大旱三年，朝廷要派官员前去“赈恤”，权豪势要刘衙内乘机保荐儿子小衙内和女婿杨金吾，并请来御赐紫金锤，以惩治百姓。他们到陈州后，擅自抬高米价，并在米中掺入泥土糠秕，大秤收银，小斗卖米。面对这种盘剥，贫苦农民张懒古据理力争，大骂刘、杨是“吃仓廒的鼠耗，咂脓血的苍蝇”，骂他们在“饿狼口里夺脆骨，乞儿碗底觅残羹”的卑劣行径。在豪强面前，他毫不畏惧：“他若是将咱刁蹬，休道我不敢掀腾。柔软莫过溪涧水，到了不平地上也高声！”小衙内用紫金锤将他活活打死，临死前张懒古一再表示：“我便死在幽冥，决不忘情”，并嘱咐儿子一定要找清官告状，抗争到底。这正体现出黄河人民那种不屈不挠的反抗意识。

① 《元典章》三十九《刑部》卷之一“豪霸凶徒迁徙”，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

② 宋濂等：《元史》卷九十六《食货四·赈恤》，《元史》第八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476页。

据《元史·成宗本纪》载，大德七年，“罢赃污官吏凡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人，赃四万五千八百六十五锭，审冤狱五千一百七十六事”^①，而《元典章》称元代官员为26690人。^②从这个数字足可以想见元代司法吏治黑暗到何种程度。不屈于黑暗势力的中州人民不仅敢于和享有各种特权的权豪势要抗争，而且敢于将斗争的锋芒直指昏庸的官府。面对衙门徇私情、贪赃枉法、糊涂判案，他们常常是据理力争，指斥怒骂。如《蝴蝶梦》中王婆在开封府公堂上几番揶揄包公“葫芦提”，指责他“官官相为”，说他“近日为官忒慕古”，“枉教你坐黄堂，带虎符；受荣华，请俸禄”。王仲文《救孝子》中开封府西军庄的李氏在丈夫前妻之子遭受冤枉时，她据理申辩；当昏庸的官府严刑逼供时，她又极力抗争，怒斥官府“一刬的木笏司糊突，并无聪明正直的心腹”，“官人每枉请着皇家禄，都只是捉生替死，屈陷无辜”。这种抗争精神，对于广大被压迫者来说，具有极大的鼓舞作用。

在我国封建社会，广大的妇女处在社会最底层。她们身受四大绳索的严酷束缚，甚至不配有做人的资格。宋代理学的强化，元代黑暗势力的肆虐，更是将女性推向了苦难的深渊。元杂剧作家在反映黄河女儿悲惨命运的同时，更善于发现她们身上所具有的高尚品质以及可贵的反抗精神，并在剧中浓墨重彩、热情洋溢地加以歌颂。首先，是对妇女贤德的颂扬。无论是为救丈夫前妻之子而甘愿牺牲亲生儿子的王婆（关汉卿《蝴蝶梦》），还是送亲生子从军而留下亡夫前妻之子的李氏（王仲文《救孝子》），她们身上无不体现着黄河女性的传统优秀品德——磊落的胸襟及自我牺牲精神。其次，是对女性的侠肝义胆的赞美。在关汉卿的《救风尘》中，汴梁妓女宋引章受郑州同知之子、花花公子周舍之骗而嫁给了他，婚后受到残酷虐待，她的结义姐妹赵盼儿甘冒风险，拔刀相助，只身赴郑州与纨绔子弟周旋，凭着自己的聪明、智慧和胆略，终于斗败周舍，救出了落难的姐妹。

黄河女儿的优秀品质及反叛意识，还集中反映在她们的爱情婚姻生活

^① 宋濂等：《元史》卷二十一《成宗四》，《元史》第二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56页。

^② 《元典章》七《吏部》卷之一“内外诸官员数”，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

方面。她们追求爱情自由，敢于冲破传统的“门当户对”的腐朽婚姻观念的束缚，蔑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模式，与封建婚姻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关汉卿的《拜月亭》，写大家闺秀王瑞兰在元蒙伐金的战争中与书生蒋世隆患难与共，自主成婚，当父亲王镇强行将他们拆散时，她大骂父亲是“猛虎狞狼，蝮蝎蛇”，她对爱情生死不渝，对蒋世隆表明心迹：“我宁可独自孤孀，怕他待抑勒我别寻个家长，那话儿便休想！……那玉砌珠帘与画堂，我可也觑得寻常！”在婚姻问题上，她蔑视的是门第观念，反对的是家长专横、包办，看中的是蒋世隆的“恭俭温良”，追求的是有坚实思想和感情基础的自主婚姻。这不仅是对封建门阀婚姻的否定，也是对封建礼教的强烈冲击。

黄河女儿在追求爱情、婚姻自主的过程中，还表现出强烈的自主意识。她们不认为自己的地位比男子低下，是家庭、婚姻中的被动者，而是追求夫妇平等，互敬互爱，彼此忠诚，互不背叛。白朴的《墙头马上》，歌颂了洛阳女子李千金的敢作敢为；无名氏的《举案齐眉》，借东汉梁鸿、孟光的婚姻故事，反映出黄河女儿对夫妻相敬如宾、贫贱不移的婚姻的向往与追求。更值得赞赏的是，这些女性为了追求真正的爱情与理想的婚姻，往往是甘贫守志，经得起挫折和考验，对爱情坚贞如一。如洛阳女子刘月娥轻视功名富贵，看中夫妻感情，和丈夫忍饥寒、住破窑、同甘共苦（王实甫《破窑记》）。显然，这是一种悖逆于封建道德的全新的婚姻观念。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现存的以中原地区为故事背景的几十种元杂剧，还为我们描绘了元代中原社会的市井生活、世俗风情。张国宾的《合汗衫》，写南京城（金灭北宋后将都城从开封迁到南京）张义父子先后救助落难的外乡商人陈虎、赵兴孙；无名氏的《刘弘嫁婢》，写洛阳刘弘照料素不相识的钱塘理官李逊的妻儿，并收留父死窘困、流落异乡、走投无路的裴兰孙。这些作品不仅反映出黄河人民乐善好施、接困济厄、扶孱助弱、宽厚待人的淳朴民风，而且反映出当时汴京的商业繁荣及其对外乡人的莫大吸引力。关汉卿的《绯衣梦》，写王员外与李十万两家指腹为婚，后来李家“穷乏”，王家就派人送去十两银子，一双鞋儿，“碴断线脚儿，便罢了这门亲事”，再现了元代中原地区的婚约习惯；王实甫的《破窑记》，

无名氏的《符金锭》，均借历史人物来反映中原地区富贵之家抛绣球择婿的习俗。无名氏的《留鞋记》，在肯定市民社会婚姻价值观念的同时，对古都汴京元宵灯节的热闹情景也作了逼真、生动的刻画：“车马践尘埃，罗绮笼烟靄，灯球儿月下高抬”；“天澄澄恰二更，人纷纷闹九垓。……你看那月轮呵光满天，灯轮呵红满街，沸春风管弦一派，趁游人拥出蓬莱；莫不是六鳌海上扶山下？莫不是双凤云中驾辇来？直恁的人马相挨。”“看一望琼瑶月色，似万盛琉璃世界，则见那千朵金莲五夜开。笙歌归院落，灯火映楼台。”这种元宵节观灯的习俗历代相衍，至今不衰。此外，元杂剧还反映了中原都市生活诸如脂粉铺、绒线铺、罗缎铺的精细经营，生药店、烧鸭店、豆腐店的红火生意，小商小贩走街串巷以及清明节祭扫祖坟、以物为赌等习俗，在今天的中原地区仍能找到它们所留下的遗风。

隋唐以来，科举成为广大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重要途径，然而，靠马上征服天下的元蒙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罢黜了科举，蔑视儒生，堵死了知识分子的仕进之路，这就使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沦于社会的底层，他们食不果腹，衣不胜寒，以至于当时有“八娼”、“九儒”、“十丐”之说。^① 中州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在元杂剧中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反映。《看钱奴》、《金凤钗》、《合同文字》、《拜月亭》、《生金阁》、《罗李郎》、《忍字记》、《灰阑记》、《范张鸡黍》等杂剧，就从不同侧面再现了中州知识分子的落魄境遇，在发出“儒人不如人”的悲叹。但是，大多数知识分子并不甘沦落，他们多与生活在社会底层、有着共同命运的妓女、艺人们生活在一起，通过杂剧创作，反映弱小者的不幸，讴歌被压迫者的抗争，表达下层人民的理想、愿望，发出受苦受难者的呼声，为元杂剧的繁荣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明人胡侍《真珠船》卷四说，元蒙时代，“台省元臣、郡邑正官，及雄要之职，尽其国人为之。中州人每每沉抑下僚，志不得展……于是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之乎声歌之末，以抒其怫郁感慨之怀，盖所谓不得其平

^① 谢枋得：《送方伯载归三山序》，《谢叠山集》卷二，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1936）版，第21页。

而鸣焉者也”^①。这里将元杂剧视为“声歌之末”当然是封建文人的偏见，但我们由此可以看出中州杂剧作家的悲惨境遇。李春祥根据元人钟嗣成《录鬼簿》和明人《录鬼簿续编》等资料的记载，统计出中州籍杂剧作家有 8 人，他们是：彰德（今安阳）人郑廷玉、赵文殷，洛阳人姚守中，西平人李好古，汴梁（今开封）人赵天锡、陆显之，大名开州（今濮阳）人宫天挺以及古汴人钟继先（钟嗣成）。李春祥指出：“《录鬼簿》记载有名字可考的杂剧作家计 80 余人，而中州籍作家约占人数的 1/10，所录作品为 48 种。而《录鬼簿》共录剧目 450 余种，中州籍作家的作品也约占作品总数的 1/10。”^② 遗憾的是，这些作家的大部分作品都已经散佚了，今存的只有李好古的《张生煮海》、宫天挺的《七里滩》、《范张鸡黍》以及郑廷玉的《看钱奴》、《忍字记》、《后庭花》、《楚昭公》、《金凤钗》等 8 种。

钟嗣成在《录鬼簿自序》中称，元代中州剧作家大都“门第卑微”、“职位不振”。^③ 如姚守中为“平江路吏”，赵文殷为“教坊色长”，宫天挺曾“为钓台书院山长，为权豪所中，事获辨明，亦不见用”，赵天赐为“镇江府判”，明无名氏《录鬼簿续编》说钟嗣成“以明经累试于有司，数与心违，因杜门养浩然之志”。

今天保存下来的这 8 种河南籍作家的杂剧，反映的生活面相当广泛，几乎涉及各个方面社会问题。首先，是司法吏治问题。由于元代司法吏治的极端腐朽黑暗，冤狱错案堆积如山，弱者遭受迫害，作恶者则往往逍遁法外。《后庭花》就是借历史人物包拯的断案故事，来反映元代的社会现实。此剧中，作为清官的包公在审理杀人案时，始终没有详究案情的前因后果，而让赵廉访使夫人这个主谋者得以逍遁法外。包公没有依法断案，反而得到“剖决精明”的考评而“三级高升”，这无疑是对元代官场的绝妙讽刺与深刻揭露。剧中店小二逼奸害命，王庆光天化日之下杀人沉尸，都体现了元代社会秩序的极端混乱及平民生命的毫无保障。此剧中命

① 俞为民、孙蓉蓉主编：《历代曲话汇编》（明代编·第一集），黄山书社 2006 年版，第 208 页。

② 李春祥：《元杂剧论稿》，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19 页。

③ 俞为民、孙蓉蓉主编：《历代曲话汇编》（唐宋元编），黄山书社 2006 年版，第 316 页。

案的起因是因为皇帝赐给赵廉访使女侍而引起赵妻张氏忌妒，可见作品对皇帝也无不微词。其次，是爱情婚姻问题。《张生煮海》借助神话故事，表达出与《西厢记》、《拜月亭》、《墙头马上》等作品共同的爱情婚姻理想，这就是作者借剧中人物之口所说的：“愿普天下旷夫怨女，便休教间隔，至诚的一个个皆如所欲。”张生为追求与龙女琼莲的爱情，竟煮沸海水，制服龙王，人的力量终于战胜神的威力。可见，在爱情之路上，只要心诚意真，勇往直前，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这对青年男女冲破礼教罗网、大胆追求自由爱情具有极大的鼓舞作用。其三，是知识分子问题。《范张鸡黍》歌颂了范式和张劭生死不渝的友谊，揭露了权贵们把持官场、科场，“有钱的无才学，有才学却无钱。有钱的将着金帛干谒那官人每，暗暗的衙门吩咐了，到举场中各自去省试殿试，岂论那文才高低”以及“只随朝小小的职名，被这大官人家子弟都占去了。赤紧的又自权豪势要之家，三座衙门，把的水泄不通”，权豪势要当道，贤能廉直者屈沉下僚的黑暗社会实际。《金凤钗》中，秀才赵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妻子吵闹，儿子饥啼，店家逼债，濒于绝境；后来侥幸考中，但只因早朝时不慎失仪落第，就被削为平民。在他被诬判为杀人犯而执法行刑之际，就因曾救助过谏议大夫张天觉，被免去死罪，最后案情大白完全是意外。这里不仅揭示出元代知识分子穷途末路、“儒人不如人”的现实，而且提出了法治还是人治的问题。从这个剧本可以看出：元代人治代替了法治。其四，是黑暗社会下的出处问题。《七里滩》中，东汉隐士严光痛恨王莽篡权，视功名富贵如粪土，追求林间山岩之趣，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后来，做了皇帝的“布衣之交”刘秀请他做官，他不仅坚决拒绝，而且不承认他们之间的君臣关系，这显然又是对封建君权观念的否定。此外，《看钱奴》、《忍字记》等剧，借流传故事或者宗教故事，揭示出贫富不均的社会现实，对那些贪财悭吝、为富不仁之徒进行了强烈嘲讽，对浇薄的世风进行深刻的批判。透过这些不乏宿命论及宗教色彩的戏剧故事，不难感悟到作者对现实的愤激和否定。

河南籍剧作家的杂剧作品不仅广泛反映了元代一系列带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而且这些杂剧作品在艺术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在元人杂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李好古的《张生煮海》和尚仲贤的《柳毅传书》并称

为元代神话剧的“双璧”；郑廷玉的《看钱奴》被视为元代讽刺喜剧的代表作，甚至被译到国外，影响世界剧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古汴杂剧作家钟嗣成花费十余年心血精心结撰的《录鬼簿》，一反传统，为杂剧作家树碑立传，不仅记录了大量的元人杂剧作家作品，为我们勾勒出元杂剧发展的大致轮廓，而且评品人物，指出其作品的得失，表现出进步的艺术见解。李春祥在《元杂剧论稿》中称赞它“既是元代戏曲家写的当代杂剧史，同时又是我国古代戏曲史的开山之作”^①，在保存文化遗产与开拓戏曲史写作两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元代中州散曲作家

元代中州籍散曲作家有作品流传的共 8 人，其中前后期各 4 人，且不乏像王恽、姚燧、钟嗣成这样的大家。他们不仅在中州本土参与了散曲的创作，寓居他乡时又将这种创作传统带到了寓居之地，推动了散曲艺术南北创作个性的交融。中州士人的遭遇，是华夏民族在蒙元时代悲惨遭遇的缩影；他们以散曲写景咏物、言情抒怀，交际祝颂，借散曲发抒其不平之鸣，则代表了元代散曲创作的主要倾向。散曲艺术是南北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州士人为散曲艺术的繁荣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

在元代有散曲流传至今的 200 多位作家（无名氏除外）中，可以确定为中州籍的作家共有 8 人。他们是王恽、姚燧、郑廷玉、姚守中、赵天锡、钟嗣成、班惟志、孙周卿。另有卢亘和宫天挺，虽无散曲作品传世，但从《小山乐府》、《古山乐府》中所收录的张小山、张野和卢亘的曲作以

^① 李春祥：《元杂剧论稿》，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5 页。

及钟嗣成《录鬼簿》所记载的宫天挺的生平情况，可推知他们也是当时颇负盛名的散曲作家，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其作品没有流传下来。仅从数量上说，元代中州散曲作家并不引人注目，但通过对这些为数不多的作家及其创作的定量分析和仔细考察，我们可以寻绎出元代散曲创作的某些带规律性的问题，加深我们对元代散曲创作的某些本质问题的认识。

综合各种资料，以上 8 位散曲作家的情况是：

王恽(1227—1304)，字仲谋，号秋涧，卫州汲县(今河南卫辉市)人。中统元年受左丞姚枢赏识延为幕僚，后入中书省，历官翰林修撰、监察御史、翰林待制等。著有《秋涧集》。传见《元史》卷 167。王恽是元初诗文大家，《中州名贤文表》称其“为文不蹈袭前人。操觚染翰，经旨之义理，史传之铺陈，子集之英华，古今体制，间见叠出。雄深雅健，辞古而意不晦。绚持文柄，独步一时”。清代顾嗣立在《元诗选》中评价道：“秋涧诗，才气横溢，欲驰骋唐宋大家间。”虽未免过誉，但足见王恽诗文成就之令人刮目相看。王恽一生性格耿直，官运亨通，操履端方，恪守儒道。今存小令 41 首，作品书卷气、官场味较浓，反映出散曲发展过程中元初官场文士染指的初期特征。

姚燧(1238—1313)，字端甫，号牧庵，洛阳人。三岁而孤，依伯父姚枢成人，又受学于名儒许衡。至元间为陕西汉中道提刑按察司副使、翰林直学士、大司农丞。大德间出任江东廉访使，后拜江西行省参知政事。至大间官拜翰林学士承旨，致仕后居潜江(今属湖北省)以著述自娱。传见《元史》卷一七四。著有《牧庵文集》。姚燧是元初古文大家，《元史》记载，他“由穷理致知，反躬实践，为世名儒。为文闳肆诙洽，豪而不宕，刚而不厉，春容盛大，有西汉风。宋末弊习，为之一变。盖自延祐以前，文章大匠，莫能先之”。“当时孝子顺孙，欲发挥其先德，必得燧文，始可传信；其不得者，每为愧耻。故三十年间，国朝名臣世勋、显行盛德，皆燧所书。”张养浩在《牧庵文集·序》中亦称：“公才驱气驾，纵横开阖，纪律惟意。……约要于繁，出奇于腐，江海驶而蛟龙拿，风霆薄而元气溢。”《元诗选》二集卷五称姚燧：“时元宅天下已百余年，倡鸣古文，群推牧庵一人，拟诸唐之昌黎，宋之庐陵。”说其古文成就与韩愈、欧阳修相比并，当然有失确当，但从中可以窥见姚燧古文成就之高。今存小令

29首，套数1套。作为一代名儒，姚燧的古文当然要板起面孔阐发六经之旨，但我们通过他的散曲作品，看到了姚燧丰富的情感世界。在其散曲中，大凡官场感喟、别情别意、乡思宦愁、宴饮欢聚、赠送酬答、描情绘景、韶华短暂、春愁冬怨，无不摄入其中。而写得最为出色的，是那些表达男欢女爱的篇什，将相爱的男女那种相爱的情状、刻骨的相思以及密约偷期的幸福渲染得淋漓尽致。

郑廷玉，彰德（今河南安阳）人，生平事迹不详。钟嗣成《录鬼簿》将他列于“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之列，名次在关汉卿、高文秀之后。著有杂剧23种，今存5种。散曲今存名为《金山寺》的残曲，以男子口吻骂女子负心，在元曲中颇为别致。从钟嗣成《录鬼簿》编撰的原则和郑廷玉今存杂剧对元代社会市井百态的成功描摹、对当时社会丑恶的无情鞭挞以及作品的质朴来推测，郑氏显然是一個长期生活于中州地区的下层文人。他的历史剧《疏者下船》宣扬子孝妻贤、弟兄情深等伦理纲常观念；公案剧《后庭花》在揭露元代社会秩序混乱、颂扬清官的同时，反映即使清官也不能严格执法的封建社会的司法吏治问题；《金凤钗》歌颂清官的智慧，鞭挞世道的险恶，表现当时知识分子的穷途末路；神仙道化剧《忍字记》主张与世无争，客观上批判了富人的悭吝与残忍，揭露了佛门的虚伪；讽刺喜剧《看钱奴》宣扬贫富由天的宿命论与因果报应观念。虽然沦为九等“贱民”，但骨子里的儒家意识却在作品中时有展露。

姚守中，洛阳人，姚枢孙，姚燧侄。从其家世不难推知，他自幼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录鬼簿》将其列于“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之列，说他曾为“平江路吏”。平江路为元代所置，辖今江苏吴县常熟、昆山等地，治所在今江苏吴县。所作杂剧3种均佚，今存套数【中吕·粉蝶儿】《牛诉冤》。全套曲子用寓言体的拟人化手法，借一头即将被屠宰的老牛之口，控诉了是非颠倒的社会现实，曲折地反映了元代知识分子屈沉下僚、志不获展的尴尬处境。作品构思别出心裁，手法新颖巧妙，匠心独具，在整个元人散曲中可谓上乘之作。与曾瑞的【般涉调·哨遍】《羊诉冤》、刘时中的【双调·新水令】《代马诉冤》有异曲同工之妙。

赵天锡，孙楷第《元曲家考略》谓其名禹珪，字天锡，汴梁（今河南

开封市)人。《至顺镇江志》卷十七谓其曾为江南行大司农司管勾;同书卷十五又谓其为镇江府判官,承直郎。钟嗣成《录鬼簿》将其列入“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之列。所作杂剧3种皆不传。今存小令5首,带过曲2首。写景、颂功之作纵横开阖,豪放旷达;抒写恋情真挚细腻,惟妙惟肖。

钟嗣成,字继先,号丑斋,汴梁(今河南开封市)人,长期寓居杭州,在古杭戏剧界享有盛名。其友人朱凯在《录鬼簿后序》中说他先后师事名儒邓文原、曹克明,并为邓、曹之高足。累试于有司,命不克遇,遂专意词曲,广交曲界同道,著成《录鬼簿》一书,给后人了解金元曲家曲作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所作杂剧7种,惜均不传,今存作品除《录鬼簿》外,尚有小令57首,套数1套。其中19首小令为吊宫大用等19位曲家而作,对这些曲家的怀才不遇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对他们在杂剧创作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高度的赞扬与充分的肯定。其他作品或抒情感怀,或写景咏物,或袒露胸襟,或怀念友人。不少作品表达出悖逆传统、否定功业、不同流俗的价值判断。

班惟志,字彦功,号恕斋,大梁(今河南开封)人。寓居杭州。至元末邓文原为杭州路儒学正,班惟志师事之。元贞间邓文原应召北上为皇室写《大藏经》,班惟志以门生随行。后官至集贤待制。致仕南归,卒于杭州。今存套数【南吕·一枝花】《秋夜闻筝》,运用一连串的比喻,将筝声之美妙动听表现得淋漓尽致,并写出了弹筝者的深沉感情以及听筝者的感受。描摹细腻,意境悠远。

孙周卿,汴梁(今河南开封市)人。《辍耕录》卷十三记载,孙将女儿蕙兰嫁与元代诗人傅若金。据傅若金《绿窗遗稿序》知,孙周卿曾以《孝经》、《论语》及女诫之书教育女儿。孙周卿曾客游湘南、巴丘。今存小令23首。大凡情爱相思、自适自娱、友情别意、赠颂祝祷、啸傲山水、睥睨功业、闺情闺意等,无不涉及。风格委婉,情感细腻。

(二)

对于元代散曲发展的分期,学术界见仁见智,有两分、三分乃至四分